

【统战问题】

#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

王振民

(西北大学 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如何治党、治国进而统一全国的方略。它既是国民党重获新生的一个表现,也是孙中山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孙中山;以党治国;历史背景;基本途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1-0073-04

The idea of administer a country by political party of Dr. Sun Yat

WANG Zhenmin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administer a country by political party which was put forward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by Dr. Sun Yat was an important general plan to run political party and administer a country and unify China. It was not only an expression of the Kuomintang being rebor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ign of Dr. Sun Yat's changing thinking.

**Key words:** Dr. Sun Yat; administer a country by political party; historical background; basic means

## 一、以党治国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20~3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但帝国主义依旧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在提出以党治国方略时,世界主题依然是战争与革命。中国依然面临“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局面,而且国内政党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国家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真正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的力量只有苏俄。以党治国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希望通过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首先求得国民革命的真正胜利,以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结束中国任人欺凌、四分五裂的局面,进一步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1923年10月10日的广东支部党务讨论会上,孙中山提出应效法俄人以党治国的思想。同年

10月15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他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sup>[1]</sup>孙中山之所以强调要以党治国有着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其一,国民党内部思想、组织的混乱状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因素。辛亥革命后,一些官僚政客混进了国民党,许多投机分子想凭藉国民党的招牌来谋取个人的权势和私利。一方面是“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但是“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sup>[2]</sup>一些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党员,也颓废消沉。“从前曾推驴车在黄河一带从事宣传的老同志”,竟变成臭名远扬的“猪仔”;“从前曾为民国打

收稿日期:2004-10-14

作者简介:王振民(1972-),男,陕西澄城人,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过疆山的健儿,现在亦变为背党降北的叛徒”。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成分依然十分复杂,许多党员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sup>[3]</sup>“到了革命以后,各党员知道没有抄家灭族的危险,只有升官发财的好处,所以分子越变越杂。”尤其是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背叛,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完全没有想到祸患竟生于肘腋,干戈竟起于肺腑。“国事为所败坏,党义为所摧残。”<sup>[4]</sup>这对孙中山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在《致国民党员书》中,他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sup>[3]</sup>他曾表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sup>[5]</sup>虽然当时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军阀产生的根源以及他遭受失败的真正原因,但是惨痛的教训推动着他去探索新的道路,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过去“排满”、“倒袁”、“护法”大旗进行三次革命有始无终而归失败的原因在于党的势力未见增进。而“推思其故,殆有三端”,一是“党中缺乏组织”,“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二是“自改组国民党,本党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三是“本党之根基未固”。而且“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sup>[1]</sup>

其二,中国革命的现实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因素。孙中山在绝望中,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由俄国革命成功观察之,我们当知军队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他通过对苏俄革命了解后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的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孙中山强调指出,国民党“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sup>[1]</sup>国民党要借鉴俄国的经验,把“党巩固起来”,把党义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

功,必定更大。”同时,在“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现实一方面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屡遭挫折,另一方面是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斗争中,使孙中山从工农运动中看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他指出:“人心就是立国的根本”,国民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但要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那时,“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sup>[1]</sup>

## 二、实现以党治国思想的基本途径

孙中山在广东总结过去失败的经验时说:“在辛亥年,假如有好的方法能实行以党治国,我相信从南京政府以后,决不致弄到今日,象这样的大失败(指陈炯明叛变)。”“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sup>[3]</sup>他在借鉴俄国革命党人成功经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的基础上,开始以广东为基地,探寻以党治国的新道路。

第一,着重宣传是实现以党治国的第一步。针对以前国民党忽视“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以及“忽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缺点”,“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在失败面前认识到革命宣传的重要性。孙中山沉痛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各省人民受到本党主义的宣传,就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取得全国统一的大效果。而“何以十二年以来,不能一气呵成,建设民国呢?”“就是因为国内大多数人民,还不明白民国的道理,不了解本党主义。”<sup>[1]</sup>以前革命之所以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就在于“本党放弃了宣传,这是个大错误。”正如他一再强调:“我党兵力虽弱于人,惟主义则高尚于人,久为国人所信仰。”若党能用宣传主义来感化他人,则定能战胜一切。“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sup>[1]</sup>他说:“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sup>[1]</sup>要实现宣传的功效,必须把党内宣传和党外宣传结合起来。孙中山指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党员自己必须“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然后用之出而宣传,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只有倚靠宣传之力,方能使党员人人能奋斗,主义能实行。孙中山希望通过宣传,把那些最反对的心理,变成最赞成的心理,热心为本党尽力,替本党的主义去奋斗。在实现以党治国的基础上,凭借宣传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去自

然统一全国，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从而实现以党治国。在宣传的手段上，孙中山认为，必须从以前“人自为战”的宣传向有胆识、有系统、有纪律的宣传转移，方可取得革命的真成功；在宣传的对象上，孙中山吸收了俄国革命党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俄国革命党在几年内能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是因为其军队全属党人。他提出，党的宣传功夫，应极力从党的基础—军队入手，才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基础。同时他又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应“由民众发起，亦由民众成之”<sup>[2]</sup>。革命行动若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党的宣传应该是面向全国民众，使全国人都明白革命的主义、建设的主义，方能造成一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而“要做宣传，就要有一个最便利的机关、最巩固的机关。这个机关是什么呢？就是个党”。

第二，振兴党务是实现以党治国的关键。孙中山在广东创建大本营，作为实现救国的策源地时，国内人民加入国民党的人寥寥无几，国民党的党务日益衰落。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深刻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党员入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更谈不上为主义牺牲；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在本党分子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不情愿加入，帮助本党来奋斗。”<sup>[1]</sup>他认为，振兴党务要立远大之眼光，不可斤斤于目前之小利。在孙中山看来，为了改良和扩张党务，首先必须把党基巩固起来，改进国民党内部存在的“组织未备、训练未周”的状况，“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用政党的力量来克服党员“以往不守党中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sup>[3]</sup>进而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其次是要教育党员树立有组织、有主义的良好行为规范和理念。把那些不良分子设法淘汰，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孙中山指出，对党员来说，要有资格去宣传主义，做真正的革命党人，首“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为谋公众之自由。”<sup>[1]</sup>只有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居心发财，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党的基础才能够巩固，党的地盘才能够保守。最后，

全党还须树立继续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党员不可因为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懒，失却原来的奋斗精神，以至于海外各处党务都没有朝气而暮气很深，这会使党的前途很危险。孙中山认为，要做一个真党员，必须恢复以前为党奋斗的精神，要存心做人事，不可存心做大官，不能心存“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去抵制革命党。更不能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便不肯继续做革命事业。甚至“许多革命党人反藉革命以谋个人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sup>[1]</sup>更要防止“不肖党员，行为不正；或假本党党员名义在外招摇”而痛失全国人心。1923年在上海演说中，孙中山认为，要实现党的主义，“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还说不定成功与否”，“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只有把党务做好了，就不会招致以前那样的大失败，党的事业才可望蒸蒸日上，以党治国才有希望。

第三，增强“党制服军队的力量”是实现以党治国的重要环节。虽然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认识到，“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悔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的重要性；虽然孙中山在1917年有了他倾全力装备并用国民党的一些军事人才配备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的“援闽”粤军，第二次北伐却宣告失败。正如孙铎在《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他的感情为转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够翻脸，明天或成仇敌”，而不能依靠民众，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单靠一个军阀的军队打倒另一个军阀的军队，从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众幸福是不可能的。他体会到组织一支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和它的极端重要性。孙中山认为，军事的奋斗和宣传的奋斗都是实现以党治国的基本手段，两者并行不悖。要推翻不良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军事的奋斗是必不可少。但是如果谋私利者掌握军权，而不能以主义感化其部下，那么军事奋斗就纯为升官发财，革命成功的机会甚微。而“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用孙中山的拥护者朱执信的话说就是要以当时苏俄的劳动军为榜样，建立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孙中山一再教育国民党的军官：“军人之天职，首重服从命令，抱定宗旨而行，幸勿朝秦暮楚，致受灭亡”。<sup>[2]</sup>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讲话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

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sup>[6]</sup>同时孙中山还注意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主张要以全力对游民土匪及军队宣传革命的主义,要求“努力宣传于一切军队中,使了解于其自身之地位,变反动兵力为革命的兵力”,使军队“必须为主义去牺牲,不要为金钱去牺牲”。这需要党来领导组织军队,使党员能够成为军队中的中坚力量,进而通过纪律和宣传的方法使军队能够为党义而战。“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孙中山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制度并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这使军队能够有旺盛的奋斗精神,并能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拥护。其为以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部分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武力保证。

### 三、以党治国思想提出的意义与局限性

从根本上说,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本质就是得民心,以主义征服,从而达到革命成功。它一方面说明孙中山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力图通过政治、军事、党务进行的有机调和达到巩固党基,进而统一全国目的;另一方面它表明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事实面前,打破了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幻想,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抓住立国的大根本——人心,期望用党义和党员奋斗来实现革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党治国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一,以党治国思想为制定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中体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在经过多次革命后,孙中山感到要进行中国革命,必须有一个能联合各界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必须以俄国的援助为依赖。孙中山明确指出,以党治国需要能胜大任的人才,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时机或者一个地方,于本党中求不出人才,自非借才于党外不可”。孙中山深刻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sup>[6]</sup>共产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sup>[7]</sup>

第二,以党治国思想为国民党获得新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克服了国民党以往不注重国民党自身建设,严重忽视人民群众和轻视其他先进政党力量的缺陷。通过对国民党党员进行“整理党务运动”,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净化国民党队伍的功效。从而为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纪律、有组织、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政党作好了思想导向工作。它对改进国民党在广东的党务,建立一个普遍的全国国民党作好了舆论上的准备,进而对国民党改组的顺利进行以及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毕竟受封建余毒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以及国民党内部思想、组织的混乱状况的限制,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sup>[8]</sup>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内状况决定了以党治国的理念不可能真正贯彻下去,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救国方案蓝图的一个理想。而且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肯定了人民的伟大力量,但是由于其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所以他眼中的人民不过是“庸愚”的阿斗。这样一来,以党治国论就变成“先知先觉”治国论。更可悲的是在蒋介石集团叛变国民革命后,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方略名存实亡,被演变为“一党专政”。这也是邓小平为什么批判蜕变后的国民党以党治国观念的根本原因。<sup>[9]</sup>但是,即便如此,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依然在中国革命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4]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6] 尚明轩.孙中山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 [7] 苗建寅.中国国民党史[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 [8]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9]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杨彬智]